

回憶刘志丹和謝子長

閻紅彥等著

回憶刘志丹和謝子長

閻紅彥等著

陝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六一年·西安

回憶刘志丹和謝子長

閻紅彥 等著

*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西安北大街109号）

西安市書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01号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

787×1092毫米 1/32·3 $\frac{1}{2}$ 印张·62,100字

1961年11月第1版

1961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0 定价：（5）二角四分

統一書号：T11094·6

目 次

回忆陕甘高原早期的革命武装斗争·····	閻紅彦 (1)
学习志丹同志的革命精神·····	馬錫五 (25)
刘志丹太白收枪·····	刘景范 (33)
筲帚把子换手枪·····	郭根存 (44)
刘志丹的故事·····	黃 伊 (48)
回忆刘志丹同志二三事·····	孔令甫 (59)
一双麻鞋·····	陈策賢 (65)
看望刘志丹·····	刘占江 (68)
和刘志丹同志最后在一起的时刻·····	裴周玉 (73)
民間的謝子长·····	魏 伯 (88)
上鈎·····	薛聚洲 (95)
雪地上的羊蹄·····	柯 藍 (102)
子长負伤以后·····	叶 濱 (105)

回忆陝甘高原早期的革命武裝斗争

閻紅彦

陝北这个地方，过去是一个地广人稀、經濟十分落后的地区。封建剝削和軍閥專橫特別厉害，人民的生活非常痛苦。地主、富农霸占着最好的平川水地，租种土地的农民，受着高额地租的剝削。地主豪紳們还直接向群众派款办民团，用来维护他們的特权。农民往往因为交不起租子，或者什么事情“冒犯”了地主豪紳們，就被团丁抓去押起来，挨打、罰款。

盘踞在陝北已久的軍閥——土皇帝井岳秀，与当地統治階級勾結起来，欺压群众，无恶不作。他依仗着枪桿子，把持政权，委派官吏。除了一般的捐稅以外，当地駐軍，大小軍官，都可以随意向群众勒索維持費、修造費、粮秣費、購置軍械費、棉夹单衣費、鞋袜費、年关費，以及种烟稅和白地稅（不种大烟的地）等等，苛捐杂稅，将近百种。他們还通过放賭場，开烟館，进行畸形的高利貸剝削，并毒害了不少的青年。不仅一个班、排、連长，可以随便拉夫、派牲口，甚至霸占民間妻女，就是班、排长的同乡亲戚，也可以派伙子、派牲口。群众受尽了他們的欺侮、剝削，遭受冤枉杀害的人不知有多少；有好多农

民，被迫流离失所，四处奔逃。軍閥部队中的士兵，也有不少因受不了打罵虐待的痛苦，开小差跑到山里去当土匪，这些土匪又往往被軍閥和民团利用，反过来残害群众。

封建軍閥、地主的压迫和剝削，使本来就非常落后的生产力，更加受到了破坏，許多农民都过着“餓不死，活不成”的痛苦生活。就是一个中农家庭，在歉收年成还要吃树皮草根，甚至卖儿卖女，貧农、佃农的处境就更不用說了。农民群众因为受不了这种欺凌、压搾，常常暴发自发的反抗斗争。例如，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三年間，安定县因增收羊圈稅，激怒了两三千农民群众，包围了县衙門；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五年間，靠近陝北的甘肃环县，有三、四千农民起来反抗官府，杀了县知事，分了土豪劣紳的財物，先后起来响应的有好几万人，震动了陝甘边界上的十多个县。但是，这些可歌可泣的英勇的群众斗争，由于沒有明确的斗争目标，沒有革命政党的领导，結果都在反动統治階級的残酷镇压下失敗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革命的思想傳播到了陝甘地区，人民的革命斗争才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

革命思想在陝北的傳播，也是先从进步的知識分子中开始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前，陝西有不少青年在北京、上海等地讀書，有些进步分子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

并且加入了共产党或共产主义青年团。其中有些人回到陕北故乡后，宣傳革命思想，进行革命活动。如李子洲、魏野畴等人，在榆林中学、綏德师范組織学生会，成立党的支部和共产主义青年团，推銷“中国青年”、“向导”等革命书报。在他們的影响下，許多青年逐渐觉醒起来，参加革命团体，开始走出校門，向工农劳动群众宣傳革命道理。特别是李子洲同志创办的綏德第四师范，后来成了在陕北傳播革命种子的园地。这些学校的革命教师和学生，有的回到乡下办小学，成了党在农村中的宣傳員和組織員；有的打入軍閥部队和民团中去进行革命活动。

一九二四年，謝子长同志在安定办起了民团，当了团总；李象九同志去北京与党取得联系后回到陕北，利用同井岳秀部下連长石謙的同乡关系，当了安定的巡官。謝、李二人利用自己的合法地位，在安定一带进行革命活动。同年，石謙这个連扩編为营。为了利用这个关系和机会，謝子长同志把他的民团改編为一个連，自己任連长，加入石营。石謙还要李象九給他新成立一个連，由李担任連长，石只管发枪发款，連队的士兵和軍官完全由李自己招收，党又利用这个机会，从榆林中学、綏德师范調来史唯然等同志担任班、排长。全体士兵，完全是在学生及农村的青年中招募的。因为这个連中，学生占大多数，所以当时群众称这个連为学兵連。

这两个連成立以后，党从北京、綏德、榆林等地調来

了一批黨員，担任教育和訓練工作。連里每天除了兩小時的軍事訓練外，絕大部分時間都是用來學習政治和文化，講解“勞農政府”、“馬克思主義淺說”、“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等。那時，共產黨員李子洲、魏野疇、楊明軒等同志亦常來講演，宣傳革命。連隊里還訂了“中國青年”、“向導”等雜誌，革命思想在部隊中很快地傳播開來，黨及時的在連隊里秘密建立了支部，發展了不少的黨員。

在大革命高潮的形勢下，陝北和全國各地一樣，在工人、農民、學生、軍隊中都展開了轟轟烈烈的群眾鬥爭。學生運動比大革命初期發展的更加廣泛，學校討論社會科學之風大興。各校都組織了學生會，學生常常在街頭集會講演、喊口號、貼標語、遊行示威，下鄉宣傳，幫助農民組織農民協會，反對貪官污吏、土豪劣紳，不少學校變成了當地群眾革命活動的中心。農民運動也廣泛深入地開展起來了。普遍地成立了農民協會，有些地方還組織了農民自己的武裝，領導廣大的農民群眾向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展開了激烈的鬥爭。謝子長同志領導安定縣農民協會公審了人人痛恨的宋應昌、王毓書、王伯揚、李耀輝等豪紳，因此，周圍的群眾都很敬佩他，稱他“謝青天”。

這時候，石謙這個營已經擴大為旅了，黨在這個部隊里的革命活動也更加活躍。為了掌握這支武裝，黨從黃浦軍官學校和毛澤東同志主辦的農民運動講習所，派來了一

批黨員，加強對這支武裝的領導，並且在石謙這個旅中建立了教導隊。這時候，全旅十多個連已有六個連長和將近二百名士兵入了黨。我們這兩個連還建立了革命的政治工作和嚴格的紀律，大家的革命熱情極為高漲，公開宣傳革命，積極開展群眾運動，經常組織講演團和宣傳隊，並且吸收駐地附近學校的教師、學生參加，向群眾宣傳識字、放腳、剪髮、禁煙、反對土豪劣紳、反對苛捐雜稅、反對高利貸、反對官方放賭、反對軍隊拉差等等，和農民群眾一道積極投入鬥爭。連隊本身亦禁止抽煙、喝酒，提倡艱苦樸素的作風，紀律很好，不拿群眾的任何東西；同時在士兵中還成立了自治會，組織唱歌、打球、演“文明戲”等文娛活動，每天傍晚，國際歌、少年先鋒隊歌的歌聲常常吸引着鄰近的群眾。我們和群眾建立了深厚的關係。在革命的大風暴面前，在黨的宣傳影響下，石謙也逐漸贊助革命了。

在這激烈的階級鬥爭中，廣大群眾的階級覺悟大為提高，各個方面都涌現了大批的堅定勇敢的積極分子。陝北黨不僅在城市的革命青年知識分子中有了很大的發展，同時，在工人農民中也發展了一批黨員，在农村中開始建立了黨的支部。黨在石謙這個部隊里的活動，不只限於原来的那兩個連隊了，在整個旅中都開展了革命活動。

二

广大群众的革命怒潮正在汹涌澎湃地发展，革命力量正在势如破竹地向前迈进的时候，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叛变了革命，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发动了反革命的政变。

大革命失败后，反革命向革命大举进攻，镇压革命运动，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不少的党组织被破坏了，农民协会、工会、学生会等革命团体被解散了。军阀井岳秀首先勒令封闭了绥德第四师范，对我们这支实际为共产党领导的、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受过革命训练、经过革命锻炼、并且和群众有了联系的武装，更仇恨更害怕，极力企图加以扑灭。井岳秀乘石谦到榆林给他拜寿的机会，威胁石谦把谢子长和李象九交出来或赶出部队，石谦为了自己的地盘和势力，同时对革命也有所同情，没有答应。可是井岳秀并没有忘记这支部队是他的“心腹之患”，在南昌起义后不久，就把石谦暗杀了，并且密令解除谢、李二人的武装。

石谦被井岳秀暗杀的消息传来后，整个部队极为愤怒，党抓住这个机会，立即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我们当时驻在清涧，那几天，常有地方党的人来联系，空气十分紧张。陕西省委秘密派来的担任军委工作的唐澍同志，向我们介绍了国内局势，讲了蒋、汪叛变革命和南昌起义等情

况，大家听了都很激动，感到只有武装起义才是对付敌人最好的办法，也开始意识到要保证革命取得胜利，就必须有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支部紧接着召开了党员大会，传达了省委关于利用石谦被害的机会、以“为石旅长报仇”为口号、举行武装起义的指示，并通过了武装起义的决议。大家都很兴奋，欢呼我们独立的革命队伍马上就要诞生了。

第二天——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二日，地方党派来参加起义的教员、学生和农民都集中到我们这儿来了，领取枪支、弹药，进行各项准备工作。有的擦枪，有的写标语……整整忙了一天。天刚黑，李象九同志就庄严地宣布了全旅起义的命令，革命的火焰在清涧燃烧起来了。

次日，起义部队浩浩荡荡地从清涧出发，一路打下延川、延长，占领了宜川。在延长活捉了反动营长祁梅卿，并且把他带领的一连人全部缴了械。沿途，地方党发动了不少党员和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参加了我们的队伍，部队进一步壮大了。

在宜川，二千多人的队伍改编为四个营，推举李象九为旅长，唐澍为参谋长，谢子长为第一营营长。这个旅虽然是党领导的，可是成分很复杂，参加起义的动机也各有不同；加以当时领导上缺乏经验，没有重视首先整顿内部，也不懂得发动众多的农民群众参加，更不懂靠近山地开展游击战，建立根据地。因此，开始听说井岳秀派来大

兵追趕我們時，还想守宜川，打硬仗；當敵人四面圍攻我們時，又倉卒決定突圍。由於事先聯系不好，最後只有謝子長同志率領的第一營，和其他營中的几百青年突圍出來了，第二營和第三營大部分沒有退出。突圍出來的部隊，退到宜川西南的大南川以後，利用軍閥之間的矛盾，爭取時間，在韓城西莊進行了一個多月的整頓。這時，陝西省委派來了許多同志，總結了清澗起義的經驗，並決定由唐澍同志任總指揮，謝子長同志任副總指揮，高舉革命旗幟，正式成立西北工农革命軍，準備在陝北建立革命根據地。可是仍然沒有接受教訓，又決定攻打宜川，和優勢的敵人打硬仗，結果受了更大的損失。

三

雖然清澗起義以及隨後在一九二八年四、五月間的渭華、栒邑起義，都失敗了，受到了很大的損失，但是它的意義和影響是深遠的。我們絕大多數同志和廣大群眾，並沒有被反革命的鎮壓所吓倒，而是更加堅強了。革命鬥爭在各方面仍然繼續堅持地開展起來。黨一方面利用統治階級內部的各種矛盾，派了一大批搞武裝鬥爭的同志到各個軍閥部隊中去，繼續進行兵運活動，以便積蓄力量，爭取時機，再行建立革命武裝。一方面把城市青年知識分子黨員大批地轉入農村（當時陝北各地的小學教員和校長，大多數都是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他們在農村群眾中進行

活动，农村党员和农村支部迅速地发展和建立起来，领导农民进行斗争。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那一段时间里，陕北各地群众性的抗粮、抗捐、抗税、抗债等斗争，此起彼伏。

由于党在农民中、青年知识分子中、军队中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使我们在革命低潮时不仅积蓄了力量，而且还积极发展了革命的力量，在广大群众中传播了革命思想和革命的种子，为后来陕甘游击队和陕甘苏区的建立，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一九三〇年，蒋、冯、阎军阀混战的结果，阎锡山倒了台，冯玉祥、高桂滋和孙殿英等部退入山西，山西局面很混乱。而这几个部队中都有党的组织，山西省委决定利用这种局面，开展游击战争。并决定根据当时晋西群众斗争的情况和驻在汾阳县的冯玉祥教导团内党的关系，首先在晋西建立游击武装。党从太原兵工厂、高桂滋部队和陕北调来一批党员，作为游击队的骨干。一九三一年春天，我们进入晋西吕梁山地区活动，不久就在汾阳永安镇发动了敌人的一个排起义，我们的队伍很快的扩大为一百多人。是年夏天，在汾阳和中阳交界的一个村庄，正式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吕梁山上第一次飘着镰刀斧头的红旗。

这时，商震当山西省政府主席，正忙于应付其他军阀的攻击，经常进攻我们的实际上只有一个营和一个连的兵

力。我們抓住时机，一面打游击，一面发动群众。游击队的人数虽然不多，但是意志坚决，战斗力很强，敌人每次进攻，都被我們打垮了。有一次，在石楼县水头鎮，敌人一个連想包围我們，結果反被我們消灭了。游击队与敌人作战节节胜利的事实，对群众的影响很深，鼓舞很大，群众工作迅速地开展起来。組織农民协会，公审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紳，开仓分粮，抗捐抗稅等斗争，鬧得热火朝天。群众发动起来了，晉西游击队站住脚了。游击队無論到哪里，都有群众給我們送粮、送情报，不少农民自动参加了我們的队伍，游击队扩大了。不久，在汾阳、孝义、离石、中阳、石楼等县一带的广大地区，游击根据地建立起来了。晉西游击队的声势愈来愈大，太原的报纸也天天登載游击队的消息。

有一次，我秘密去太原向省委請示工作。这时，商震已被其他軍閥赶到石家庄去了，徐永昌准备上台当主席。那天，他們正在海边子召开討伐商震的大会，我也溜进了会场。会上宣布商震十条罪状，其中有一条是：“晉西游击队到处活动，商震束手无策。”我听了这一条，暗暗好笑。但也感到情况将要发生变化，以后的斗争将更加艰巨。当时，山西省委对山西局势的变化已經作了分析，估計徐永昌上台后，更要加紧对游击队的围攻。因此，我一去，省委便指示了对付敌人的办法：今后游击队要分散活动，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如果敌人調遣强大的兵力围攻，游

击队无法立足时，可以过黄河到陕北去打游击。同时，省委还决定组织高桂滋部，在平定举行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

徐永昌上台后，果然采取了力图消灭游击队的措施。我回到游击队不久，徐永昌即派了一个师和一个炮兵团，共约一万多人来“围剿”我们。敌人依仗人多，每占一村一寨，就修筑碉堡，驻兵把守，残害群众。我们虽然坚持了游击活动，也打了不少的小胜仗，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游击队很难进村住了，活动的范围愈来愈小了，只能在山上打转转，依靠群众秘密送点粮食充饥，而且时有时无。同时，山西省的党组织又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失去了和省委的联系，没有省委的领导，我们的处境更加恶化。

晋西游击队成立以来，发展一直是顺利的，没有经过严重的考验。因此，在处境急转恶化的情况下，游击队内部发生了原则的分歧意见。争论的焦点是如何才能坚持革命斗争，是否过黄河的问题。当时，相当一部分人悲观失望情绪严重，只看到敌人强大、自己力量薄弱的一面，因而有的主张埋枪散伙，待形势好转后再干，不同意西渡黄河。其中一部分农民也不愿意离开家乡。有的则感情冲动，主张与敌人硬拼算了，也不同意过黄河。只有少数人坚决主张过到河西去。在激烈的争论中，我们反复地研究分析了当时各方面的情况：山西方面，徐永昌上台后，认为晋西游击队是他的心腹之患，下狠心力图消灭游击队；

在軍事力量上敌众我寡，敌强我弱，游击队的战斗力虽然强，并且在大兵围攻下，也还打了些胜仗，但是，我們只有百余人的小队伍，游击根据地虽然建立起来了，也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但是地方不大，森林又少，敌人层层封鎖后，供应沒有保障；活动十分困难；又失掉了和省委的联系，单有我們这支游击队，不可能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繼續在晋西坚持下去。而西北方面，軍閥割据林立，矛盾多端，統治比較薄弱一些；好多軍閥部队中还有党的秘密活动；陕北党的农村基层組織和群众基础亦較晋西好些，且在大革命时期，就有武裝斗争的经验，同时晋西游击队中的干部大部分是陕北人，也是一个有利条件。因此，只有过黄河才能保住这支武裝，繼續积蓄力量，坚持革命斗争。争论的结果，决定按照山西省委原来的指示精神，西渡黄河。

但是，过黄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敌人严密地封鎖了黄河两岸所有的渡口，控制了所有的船只，无法过去。这时，一場激烈的思想斗争又发生了，不少人又动摇了。在这千鈞一发的紧要关头，只好不勉强那些对革命悲观失望的人，和不愿离开家乡的战士，給了些钱让他们回家了。最后坚持过河的不到一百人。

为了不让敌人发现，我們在人烟稀少的深山里行进。一天晚上，发现山谷里有火光。楊重远同志下去一看，原来有个看西瓜的老汉，当他知道我們是游击队时，高兴地

說：“我曉得游擊隊，你們還給我分過糧哩！”並慷慨地表示：“我認得路，帶你們過河！”

我們每人背着兩支槍，緊跟着老漢爬山過嶺，不分日夜地走了一百八十里的羊腸小道，到第二天天黑，才趕到河邊的辛關附近。我們在山窩里呆了一天一夜，在這麼長的時間里，大家本來可以好好休息一下，可是心里惦念着渡河的事，誰也睡不着。听着嘩嘩的流水聲，覺着時間也象流不完的黃河水，真是難熬。第二天晚上，才找來了幾個水手，背來了幾只羊皮筏子。一個筏子只能載幾個人，還要兩個會水的人推着前進。那時正是秋天，夜晚河水冰冷刺骨，整整一夜，全部人員才渡過了黃河。

黃河在黑暗中怒吼着，東方已經有曦微的曙光，敵人還在睡夢中，我們已經勝利地到達陝北了。經過長途的急行軍、渡黃河，最後到達陝北的只剩下三十個人了。但是，這三十個人却都是游擊隊的骨干，全是共產黨員。

西北的革命武裝鬥爭，從清澗、渭華、柁邑起義均遭失敗以後，到一九三一年這一段時間內，雖然黨在农村中繼續領導農民群眾開展着反對土豪劣紳、抗捐抗稅的鬥爭，在軍事活動方面派了大批幹部，繼續進行兵運工作，但是，黨領導的打紅旗的游擊武裝活動暫時停止了。

晉西游擊隊西渡黃河的事情，最初陝北黨和群眾都不知道，我們每到一個地方，群眾就跑了。可是，我們游擊隊的紀律很好，吃了群眾的東西都留下錢和字條，說明我